

港澳的鼠疫應對與社會發展 (1894-1895) *

黃雁鴻**

一、華南地區的鼠疫及相關文獻

19世紀末期在華南地區出現了一次大規模傳播的鼠疫，流行的程度很廣泛，受影響者眾，死亡數字驚人。由於此次鼠疫造成的死亡情況和社會危害非常慘烈，有鼠疫專家甚至認為這是第三次全球鼠疫大流行的肇始。¹ 根據20世紀初印度鼠疫調查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Plague in India）顧問馬田醫生（C·J·Martin）在1911所作的報告顯示，1894年在廣東出現後蔓延至香港的鼠疫，可說是當時全球影響最廣的一次疫症：

在最近15年來，於全球蔓延最廣的一次鼠疫可說是1894年的那一次。當時發源於廣州，很快香港就出現病例。這兩個都是港口，尤其後者更和世界其他地方有頻繁的船務往來。1895年鼠疫在鄰近的一些中國港口城市出現，到了第二年（1896）擴散到孟買以及台灣。在印度，鼠疫在過去十五年於全國傳播，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7百萬人。²

由當時的報刊及文獻資料可見，這次鼠疫最先由廣州開始，及後傳至香港，由於香港當時已是轉口港，作為世界知名的商埠，香港鼠疫流行，立即引起中外的關注。與香港一水之隔的澳門也即時採取了一些預防措施，而在鼠疫出現的1894年，澳門倖免於難，並未受多大影響。但到了1895年3、4月開始，澳門也出現了鼠疫，並愈演愈烈。

過往有關這次鼠疫的學術探討已多有所出，主要集中在對廣州和香港鼠疫的研究上。有關1894年香港鼠疫的研究，有學者從不同的角

* 本文蒙澳門基金會資助，謹此致謝。

** 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編輯。

1. 王季午：《傳染病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9年，第359頁。

2. C.J.Martin. *Discussion On the Spread of Plague.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2. No. 2654 (Nov: 11,1911). PP.1249-1263.

度探討了鼠疫的起源、起因、發生過程、影響、鼠疫細菌發現以及防疫措施等諸多方面。李永宸和賴文在其專門研究鼠疫的著作《嶺南瘟疫史》中，對這次鼠疫的起病、傳播、影響，死亡情況以及應對措施都有詳細的記述並作出比較。³ 其後還專門分析了這次鼠疫在香港的流行情況，死亡人數以及防疫的直接費用。⁴ 楊祥銀則以當時港英政府對鼠疫的應對措施為出發點，指出“由1894年鼠疫所引發的一系列改革殖民政府的醫療與衛生體制、建設傳染病醫院、改善公共衛生、完善城市規劃以及健全排水與排污系統的措施都相繼得以實施與落實，它們對於健全殖民政府的傳染病預防機制和提高殖民地的公共衛生水平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⁵ 張曉輝等則認為香港在應對這場鼠疫的過程中，有值得讚許的地方，尤其是港英政府制定的一系列防疫措施中，在公共衛生方面對中國一些舊風俗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特別是對未染疫者、染疫者和染疫而死者都作出了明確細緻的規定。⁶ 崔艷紅以公共行政的角度來分析這次鼠疫，指這次是“港英政府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第一次大型公共危機事件，其應對措施可圈可點，可以視為港英政府危機管理的現代化開端。”並總結出在危機應對過程中，香港政府能夠認識到媒體和輿論的重要性並利用媒體化解危機，危機過後採取措施恢復善後並邀請專家進行危機評估，總結經驗，不斷改善危機管理措施，基本符合現代化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的特點和標準程序。⁷

至於1894年鼠疫的病源地廣州的疫情，過往對於疫症的流行情況、疫源、死亡人口等的研究可謂碩果累累。前文所述李永宸和賴文的《嶺南瘟疫史》對廣州鼠疫的出現、發展、應對作出了詳細的介紹

3. 賴文、李永宸：《嶺南瘟疫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15-604頁。

4. 李永宸、賴文：“1894年香港鼠疫考”，《中華中醫藥雜誌》，2005年第20卷第1期，第28-31頁。

5. 楊祥銀：“公共衛生與1894年香港鼠疫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7月，第68-75頁。

6. 張曉輝、蘇新華：“1894年香港鼠疫的應對機制”，《廣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10期，第142-144頁。

7. 崔艷紅：“港英政府應對公共危機管理的現代化開端——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香港鼠疫為研究對象”，《區域發展戰略》，2012年11月，第65-70頁。

和分析⁸；冼維遜徵引眾多文獻及口述歷史資料，將廣州及周邊地區的疫情進行詳細的描繪，並對疫源、疫死人口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見。⁹ 本尼迪克特（Carol Benedict）討論了1894年廣州和香港的鼠疫流行，並將研究的重點集中在有關廣州城市賑濟、善堂等慈善機構的功能、作用以及香港當局的醫療衛生政策方面。¹⁰ 此外，還有不少以社會學及歷史學角度研究這次廣州鼠疫的學術成果。¹¹ 一些聚焦於香港和廣州的比較，曹樹基以《申報》對廣州、香港和上海疫情的報道為研究對象，指出公共媒體有關政府角色的討論，已經意含對中國傳統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的否定。而“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證明了一個新的網路化的生態系統不僅改變了世界的面貌，而且改變了以往人們對於世界的認識模式，更改變了人們對於未來世界的期望和想像”。¹² 彭海雄則針對省港兩地的抗災和救災活動，由於兩地狀況不同，所取舉措不同，所帶來的成效也迥異。¹³ 這些對省港抗症措施進行比較的研究，對香港的抗疫效果評價較為正面，認為港英政府採取的措施體現了政府主導的公共政策以及管治效果，而廣州則只依靠求神問卜的傳統，以及民間慈善組織的賑濟，政府介入不深，使抗症效果不彰。

8. 賴文、李永宸：《嶺南瘟疫史》，第391-410，516-528頁。

9. 冼維遜編著：《鼠疫流行史》，廣東省衛生防疫站，1988年，第200-206、230、240頁。

10. Carol Benedict. 1996. *Bubonic Plague in 19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31- 149, 139-140, 144.

11. 這方面的研究論述包括：李永宸、賴文：“1894年廣州鼠疫考”，《中華中醫藥雜誌》，1999年第4期；李永宸、賴文：“19世紀後半葉廣州鼠疫傳入路線的探討”，《中華中醫藥雜誌》，2003年第4期；曹樹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廣州、香港和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李玉尚：“近代中國的鼠疫應對機制——以雲南、廣東和福建為例”，《歷史研究》，2002（01）；李玉尚、曹樹基：“咸同年間的鼠疫流行與雲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02）；李永宸、賴文：“廣東人間鼠疫流行與地震的關係（1867～1911年）”，《中華醫史雜誌》2000（01）；李永宸、賴文：“嶺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會背景”，《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01）等。

12. 曹樹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廣州、香港和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第72-81頁。

13. 彭海雄：“1894年省港疫災研究”，《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5月，第62-70頁。

對港英政府這次抗症成績作負面評價的是郭衛東。他以1894年香港及1895年澳門的鼠疫進行比較，指香港是政府主導，以隔離和強迫為主體的霸道式的措施；反之澳門，則是由政府提倡，民間社團共同參與，全民參與型的應對。因此澳門受鼠疫的影響和所造成的危害及人命損傷也少於香港。¹⁴ 郭衛東也以澳門的公共性防疫為主題，分析了1895年在澳門廣泛傳播的鼠疫。他認為這次鼠疫在澳門未有出現大規模流行，原因在於其防疫有普遍性、全民性、制度性、公益性這些全民參與的特性。¹⁵ 李立沿續了郭衛東的觀念，在闡述澳葡政府與華人，政府與華商，華人與華商的互動和社會效應後，分析了1895年鼠疫流行時，澳門的官、商、民如何共同抗疫，從而形成了特殊的社會互動。總結“真正在1895年澳門瘟疫中的社會互動裏扮演關鍵角色的是華商，正是華商利用他們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影響力，上可以幫助澳葡政府，使政府的各項防疫措施能夠順利實施，下可以安撫下層華民，保證整個澳門社會的穩定。所以，華商在平息這場瘟疫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¹⁶ 葡國學者阿豐素（José da Conceição Afonso）在研究澳門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衛生問題時。指澳葡政府為應對鼠疫而設立的清潔系統和防疫方法降低了這場鼠疫的死亡和影響程度。¹⁷ 雖然中葡學者在面對同一歷史命題時，都各自以其立場和觀點進行分析，但澳門在面對鼠疫的過程中，民間發揮了積極作用正是讓澳門的疫情比之省港顯得輕微和應對得當的關鍵。但到目前有關澳門這次鼠疫的研究不多，故此關於政府的措施、如何與民間協調以及民間社團如何在抗疫中擔當重任，從而奠定社團在澳門社會的重要地位，這些都是本文探討的要點。

14. 郭衛東：“應對鼠疫：1894-1895年的港澳”，《歷史檔案》，2011年第4期，80-90頁。

15. 郭衛東：“1895年鼠疫：澳門的公共性防疫——以《鏡海叢報》為主要分析樣本”，《文化》，2008年，第66期，第146-158頁。

16. 李立：“1895年澳門瘟疫中的社會互動”，《澳門研究》，2010年第3期，第125-133頁。

17. José da Conceição afonso. 2007. Macau : Contributos para a História do Abastecimento de Água Potável à Cidade. Em Revista d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de Macau*. Número 75 (1 de 2007) . PP.1282-1283.

二、鼠疫在港澳的流行情況

1894年流行的鼠疫先由廣州開始，再向周邊蔓延，並殃及港澳地區。據一名廣州的老中醫易巨蓀所言，這次鼠疫最初見於廣州老城區，死亡人數超過十萬。“甲午（1894）吾粵鼠疫流行，始於老城，漸至西關，漸海邊而止。起於二月，終於六月。疫疾初來，先死鼠後及人，有一而死數人者，有全家死絕者，死人十萬有奇。”¹⁸《申報》在鼠疫開始出現時也有所報道，指出自1894年2月下旬至4月初，廣州城南就有百多人因染上鼠疫死亡：“粵東邇因天時不正，以至疫症流行，城廂內外人民染之即斃。災最重者莫如南勝里，自二月下旨起至本月初五日止，統計疫斃男婦約共一百二十六名。”¹⁹

鼠疫在廣州傳播了個多月之後，於5月初傳入香港，《申報》於1894年5月5日刊出香港剛出現鼠疫的情況：“香港華人近得一病，時時身上發腫，不日即斃。其病初起於粵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約三十人，死至十七八人。”²⁰

這次鼠疫的影響範圍之廣以及造成的死亡數字可說驚人。根據《申報》所載，廣州和香港的疫情持續了大約三、四個月，到1894年8月，香港的疫情逐漸消失²¹，廣州的死亡人數雖不如上文所引老中醫易巨蓀所說十萬有餘，卻也有約七萬人死於這場瘟疫²²，而香港官方公佈的死亡數字為2552人²³，19世紀末期在香港工作的英國醫生Dr. Alexander Rennie在1894年夏天就這次鼠疫撰寫了一篇簡短的報告，指這次症疫在香港造成的死亡人數不超過3千人。²⁴ 另外，自1895

18. 轉引自冼維遜：《鼠疫流行史》，廣東省衛生防疫站，1989年，第203頁。

19. “時疫流行”，《申報》1894年4月29日。

20. 冼維遜：《鼠疫流行史》，廣東省衛生防疫站，1989年，第203頁。

21. 賴文、李永宸：《嶺南溫疫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1頁。

22. 冼維遜：《鼠疫流行史》，第203頁。

23.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o the Affairs of Hong Kong 1882-1899*.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26.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P.155. 轉引自郭衛東：《應對鼠疫：1894-1895年的港澳》。

24. W.J.Simpson. Plague in Hong Kong.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1. No. 2204 (Mar. 28,1903), PP.755-757.

年，香港幾乎每年都會發生鼠疫，而且集中在4至7月這幾個天氣炎熱的月份，據歐洲公共衛生學校組織（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ublic Health）於1910年代發表的報告，1895至1901年香港鼠疫造成的死亡人數為6387人²⁵，可見鼠疫在當時已演變成風土病，港英政府為了對付這種傳染病，也採取了不同階段的政策和措施。

至於澳門，在廣州和香港爆發鼠疫潮時，採取了防範措施，加強清潔和管理和外地有接觸的往來船隻，雖然逃過了1894年的疫症，但卻在翌年讓鼠疫捲土重來，為社會和經濟帶來巨大損失，造成死傷枕藉：

去歲時疫流行，省港遍及，惟於澳門一隅獨享太平，幾疑天之待澳居民為獨厚。不料自冬及春，春及夏，始而日病者數人，繼而日斃者數十人。西官極力為護，持醫院盡心而治，而病症均未能盡泯。於是人心惶惶，各自為計……每當夕陽初落，樓閣上燈，則店皆閉戶，少行人，市情之冷清，為數十年所未睹。而福隆新街，寧居里一帶繁華盛地，更門庭冷落，車馬稀疏，十室九鑿，無幾存者。而關閘門外，新累累，素冠載道，更為目不忍睹，耳不忍聞。²⁶

由《鏡海叢報》的報道可見，早在1894年冬天澳門已出現鼠疫，剛開始是幾個人染病，但後來越來越厲害，以至每日有數十人因染病死亡。澳葡官方相當關注事件，當時的衛生司司長施利華（J. Gomes Silva）於當年10月在《澳門憲報》的附報上，詳細敘述了這場鼠疫的開始、傳播、死亡數字、醫療情況和對社會的影響，資料可謂詳盡。當中所述，在1895年4至7月，全澳門有1259人死於鼠疫，當中死者大部份是華人，也有葡人、歐洲人、印度人和非洲人等。²⁷ 1895年澳門爆發的鼠疫雖在8月之後平息，但及後十幾年一直困擾澳門，從1895年1915年這20年間時有爆發，在葡萄牙學者科斯達（P.J. Peregrion da

25. *Public Health Reports* (1896-1970) . Vol.21, No. 24 (Jun. 15,1906) . PP. 655-656.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ublic Health.

26. “澳地後盛論”，澳門基金會等編：《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閏五月十一日，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257頁。

27. J.Gomes Silva. Eclaterio sobre a epidemia da peste bubouica em Macau em 1895. 《澳門地捫憲報》1895年10月1日39號附報，第429-430頁，澳門歷史檔案館藏。

Costa) 的記載中，1898到1909年間，澳門共有2594人死於鼠疫。²⁸ 這種情況和香港相似。以死亡數字比較，澳門比香港少，但香港的人口較澳門多，因此死亡情況澳門是較為嚴重的。一種傳染病在一個地方長期存在並形成風土病，不但和這個地方的環境氣候和生活習慣有關，行政當局如何應對和採取甚麼防疫措施，也是重點。事實上，香港和澳門當時同為被外國殖民管治的地方，港英和澳葡政府都引入了他們國家的抗疫和防疫手法用於港澳的華人社會，但引入的程度不同，效果不同，造成的社會影響和社會發展，也截然不同。

三、港澳的防疫措施

鼠疫的傳播載體是老鼠，而貧窮、骯髒、水窪和缺乏衛生，正是老鼠滋生的環境，也是鼠疫流行的條件。此外，鼠疫病菌大量存在於老鼠的腸道、尿液、口腔粘膜中，因此老鼠通過糞便、尿液、粘液直接傳染給人的機率最高，其次是老鼠通過污染食物和其他物品將病菌傳染給人；另一個重要的傳染媒介是人際傳播，鼠疫患者的血液、痰、膿液、以及衣物、用品都具有傳染性，可見鼠疫由接觸而感染，要防範這種疫症傳播，必須隔離病人。因此在1894至1895年港澳鼠疫流行時期，香港和澳門的抗疫和防疫措施都離不開幾樣：清潔街道和住所，隔離病人，對來自疫區的外來人口進行嚴格檢查，妥善處理疫症死者屍體。

據20世紀初任職香港首席醫療官員的艾堅遜（J. Mitford Atkinson）報告，港英政府應對鼠疫採取了五大措施，包括通報、專門醫治、消毒、隔離和清潔。他介紹這些措施的主要工作內容：

關於通報，疫症最主要的障礙在於華人未有注意這些病菌，他們寧願隱藏疫情，當有人染病死亡，就會找機會把死者屍體拋棄到街上，這樣容易把類似天花、白喉等傳染病菌人傳人。

28. P.J. Peregrin da Costa. *Medicin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Em José da Conceição afonso. 2007. Macau : Contributos para a História do Abastecimento de Água Potável à Cidade. Em *Revista d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de Macau*. Número 75 (1 de 2007). P.1283.

關於專門醫治，那些染病的人會送到西區的傳染病醫院，其中一間為政府醫院，另一家華人創辦的東華醫院，當然政府會監察華人醫院的情況。

關於消毒，這項措施很迅速並強勢實施。在1903年那一次，由於華人討厭消毒藥物的氣味，政府甚至要為他們被消毒藥水灑及的衣物作賠償。

關於隔離，在疫病開始出現時，就把可能受影響的人隔離，讓他們接受家居醫學觀察12天，在這段期間，被隔離的人仍可以照常生活。

關於清潔，每個華人家庭會接到通知，兩天之內將有衛生部門的人員來視察衛生情況，如果他們的家居骯髒，衛生部門的人員會為他們清潔。²⁹

港英政府是如何執行這一系列應對鼠疫的措施？當時的《申報》有較為詳盡的記載，不但對政府的應對手法記之甚詳，連效果和民間反應也有所報道。

對於通報，很明顯是港英政府較重視的一環。在衛生官員的眼中，華人居住區的雜亂和骯髒，為鼠疫病菌提供了條件充裕的傳播環境；此外，隱藏病人，拋棄染病者屍體，都是病菌橫行的主因，因此必須向全社會公佈這種疫症的可怕和防治之法。還要有效利用媒體，通過《申報》向社會發佈資訊，自5月5日起，《申報》就開始非常及時地通報香港的疫情。其中，5月報導疫情11次，疫情高峰的6月幾乎是逐日報導，7月報導13次，報紙能如此迅速地進行報導，一定得到了政府的有力支持。³⁰ 例如於1894年5月的一則報道：

昨日香港來電云：目下疫症未已，前日死者多至四十餘人，英官集貲另設一醫院將病人送由華人自行調治，蓋以順民情云。³¹

29. J.Mitford Atkinson, M.B.Lond., D.P.H.Camb. Plague Procedure in Hong Kong.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2. No. 2398 (Dec. 15, 1906). PP.1715-1718.

30. 《申報》，1894年5月至7月有關香港鼠疫情況的報道，包括“電傳疫信”、“西人言疫”、“港疫續紀”、“疫信照登”等標題。

31. “電傳疫信”，《申報》，1894年5月5日。

港英政府應對鼠疫的另一重要措施是醫治，上文艾堅遜所提及的西區傳染病醫院，實則有三：一為醫船“海之家”（Hospital Hulk Hygeia），一為專門收治鼠疫病人的堅尼地城醫院（Kennedy Town Hospital），這是一所由堅尼地城警署改建而成的傳染病醫院，另一為堅尼地城舊玻璃廠改建而成的中醫隔離醫院，即東華醫院分局，然而這所醫院在鼠疫後期因衛生條件日差，不適合做傳染病醫院，政府在堅尼地城修建了另外一家鼠疫醫院，即屠宰場醫院（Slaughter House Hospital）。這家醫院仍然由東華醫院管理和東華醫院醫生根據中醫方法治療患者，同時也接受政府醫生的監督。屠宰場醫院建成之後不久，玻璃廠醫院在經過清潔和消毒之後也隨之關閉。³² 此外，華人士紳還在九龍荔枝角建一個醫院收治鼠疫患者：

十六日上午十點鐘，香港紳商在東華醫院集議港地病人調理之事，……以劉君渭川為主席，對眾宣言：現官場已允撥出西灣舊玻璃廠為華人居療之所，作華東醫院分局，並由華醫生療治。³³

刻下病者十七人，死者二十五人，留住西醫院及醫船中者一百五十五人。華官度地九龍設一醫院，華人之病疫者多入院就醫，是以西醫院中人數日少云。³⁴

對於消毒和衛生清潔工作，港英政府潔淨局在鼠疫越趨嚴重的1894年5月頒佈了12條條款的《香港治疫章程》，包括規定凡鼠疫患者必須即時遷至專治鼠疫的醫院就醫、若有鼠疫患者死亡，其屍體必須在潔淨局所定專門地方埋葬，若有人患病或疑似患病，必須到最近的警署或政府部門報備以便轉介專治醫院等³⁵，除了規章定明，港英政府也切實對民居街道進行清潔和消毒：

所有毒氣留存之屋宇皆由官收管，其有可整頓，否則一律拆除。太平山及它處華人屋宇須概行拆除改造，俾免疫氣庵留。³⁶

32. *Hong Kong Telegraph*（《士蔑西報》），14 June 1894. 轉引自楊祥銀：《殖民權力與醫療空間：香港東華三院中西醫服務變遷（1894-1941年）》，香港中文大學歷史課程哲學博士論文，2007年，第40頁。

33. “港疫續述”，《申報》，1894年5月28日。

34. “港電報疫”，《申報》，1894年6月28日。

35. “香港治疫章程”，《申報》，1894年5月22日。

36. “港電報疫”，《申報》，1894年6月13日。

當時的香港是一個華人社會，無疑中國和英國存在很大的文化差異，同時英國又在香港實行殖民管治，政策帶有霸道的殖民主義色彩。如應對1894年的鼠疫，從頒佈防疫章程、治送患者、隔離有可能染病之人、處理屍體甚至強行到民居清潔和消毒，都是強勢的政府主導。當時的華人對於這些措施當然是抗拒的，例如把患者送到專門醫院一項，當時鼠疫的死亡率高達9成，若患者進了醫院，無疑只能等待死亡，而且是無親無故孤苦伶仃地等待死亡，因此港英政府應對鼠疫的處理手法引起了香港華人社會的強烈反彈，於是有人提出政府應尊重華人風俗，以華人的手法來應對：

1894年迄今，未有妥善之法以治疫，一切辦法徒使華人反抗耳。政府欲華人不潛逃不棄屍，又欲知患疫之確數，自當委曲從俗，准其在家醫理，並准其留家人三名以服侍病者。當病者移送醫廠時，強制於軟轎中，便其家人見之，驚心動魄。無怪華人有病，即逃出港外，死後即棄屍道旁也。³⁷

但從港英政府及後一連串的治疫措施看來，這個“委曲從俗”的建議並未得到接納，反而越形強勢地去執行，導致華人和殖民政府的關係緊張。代表了眾多華人利益的東華醫院向港英政府提出了很多折衷辦法都被一一否決。事實上，港英政府在這次疫症中，提出了對東華醫院的諸多不滿，尤其在中醫和中式的治療手法上，在政府醫生和當時歐人報紙看來，由華人管理的鼠疫醫院是非常恐怖的，不僅衛生情況惡劣，而且治療手段也毫無可取之處：

我們首先參觀了舊的玻璃廠醫院，但是因為所有的病人已經被轉移，沒甚麼可看的，我們只能想像發生在這裏的一切殘酷的場景，活人與死人都躺在一起。隨後我們去了屠宰場醫院，這也是臨時改建的鼠疫醫院。我推開一扇門然後進入一個小房間，在那裏我們看到四個病人。這些病人都表現出非常痛苦的樣子……男人、女人和兒童都躺在污穢不堪的地方，很顯然沒有人讓他們保持清潔，或者得到他們希望獲得的幫助。³⁸

37. 楊思賢：《香港滄桑》，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6年，第150頁。

38. *Hong Kong Telegraph*. 20 June 1894. 轉引自楊祥銀：《殖民權力與醫療空間：香港東華三院中西醫服務變遷（1894-1941年）》，第43頁。

這次鼠疫成為東華醫院發展的轉捩點，從一家純中醫的醫院，變成接納西醫而且受到政府更多管制。到了1896年港英政府以東華醫院在鼠疫過程中未有有效遏制疫情為由，成立了東華醫院調查委員會，討論醫院的改革問題，其中一次會議重點討論了東華醫院的管理問題，建議應該在東華醫院任命一位歐洲醫生或華人西醫負責東華醫院的死亡登記工作。³⁹ 港英政府趁這次機會強迫東華醫院引入西醫，以不斷加強對醫療與行政的干預。隨著殖民政府統治策略的改變以及香港社會的發展，東華醫院的中間人角色和在華人社會中的領袖地位也逐漸降低。⁴⁰

反觀澳門，澳葡政府從一開始，就運用了“委曲從俗”的態度來應對1895年的鼠疫；而且和東華醫院不同，作為當時代表澳門華人利益的主要組織鏡湖醫院，不但在華人的醫療事務上，甚至澳葡政府推行的防疫措施上，都有很大的影響力，甚至掌握了一定的話語權。

澳葡政府應對鼠疫的方法，和港英政府不無兩樣，不出檢疫、隔離治療、清潔、消毒和處理屍體。1894年鼠疫在香港流行時，澳門就頒下防疫條例，清潔環境以及防止鼠疫由外來人員傳入澳門：

.....二、每日仍應將溝渠刷洗潔淨，至華人所居坊約之溝渠尤屬緊要。其荷蘭園、新橋、沙崗、沙梨頭、望廈村、媽閣村暨龍田村等處，益為切要。

三、在割槽之地台及其左近處所，必須逐日用猛力之鹹水沖洗潔淨。

四、所有由省城或香港來澳之船及火輪渡船並小火輪渡等，務須委醫局醫生於各客未登岸之先，詣船查看，倘有華客生有疔瘡疫症，或疑其患此症者，尤須留心閱視，是為至要。

五、水師巡捕統領宜飭屬，吩咐各項船隻由省城抑或香港而來者，若疑該船內人有病症，則不准登岸。倘查出果實有患病者，應將其人留於船內，隨即照知醫局醫生，俾得前往驗視。

39. *Hong Kong Telegraph*, 30 and 31 July, 1894. 轉引自楊祥銀：《殖民權力與醫療空間：香港東華三院中西醫服務變遷（1894-1941年）》，第92頁。

40. Elizabeth Sinn, 1989.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六、無論火輪渡船及小火輪渡，各人患有此疔瘡疫症者，則不准其登岸。如有夾板並桅船或搖槳之各船隻人等患此症者，應立即用火船拖其出埠。……⁴¹

及後的六月頒佈《辟疫章程》，為預防疫症由外地傳入，澳葡政府嚴格限制了入境檢疫措施；作出對醫務安排以及進行清潔：

……三、如夜晚之時，除果有實據不測之事外，無論何項船隻，概行嚴禁與岸上人往來。

四、所有由關閘路徑來澳者，無論何人，均須經官醫驗視，方准入澳。

五、自下午六點鐘起，至翌晨六點鐘止，無論何人，俱嚴禁由關閘陸路入澳。……

九、其養生醫局須委官醫一員，司病者一名，飭赴氹仔；又委醫一員，司病者一名前往關閘；並另委官醫二員以赴船政廳。A、其派往氹仔之醫員及司病者，一經前往，須俟有人替代，或係撤委，始可回澳。B、其官醫及司病者，應由日出至日入之時，在關閘守候驗視進關之人，至晚方可回澳。C、其派往船政廳之官醫，乃係輪流值辦，但日間須常有一官醫在該處守候，以便看驗登岸各客。D、所有各醫院與及各兵營等處之醫務，統歸養生醫局總官醫料理。

十、西政務廳暨華政務廳所管理之坊約，宜按照本月十一日第十九號之第二頁附報所刊之告示，將本澳街道並住戶，統行督治潔淨。⁴²

在這段期間，除《辟疫章程》澳葡當局還頒佈了《防疫章程》《喪葬管理條例》《創設醫館條例》等，到1895年疫症在澳門越演越烈，澳葡政府還推行了多項抗疫措施，目標和香港類似，例如通報：

家有疫人，立即馳報金罷刺（camara）即舊議事之議事也，循章往報局紳，自會料理，一切周全，貧民一必破耗，官為出資，抑奚庸自費精神雇街車而犯例。⁴³

41.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五月十五日（第十九號第二附報），澳門基金會，2000年。

42.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六月初二日（第二十二號）。

43. “又弱一個”，《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四月廿八日，第225頁。

例如專設醫治鼠疫患者的醫院：

在1896年腺鼠疫蔓延時，才在唐娜瑪麗亞碉堡腳下設立了名叫唐娜瑪麗亞癩瘋院的隔離病房。1897年的衛生條例對病人隔離有如下的規定，“歐洲人、澳門土生、印度人、非洲人和華人天主教徒染上霍亂或腺鼠疫之後，送入在澳門郊區設立的癩瘋院，華人患者如果不願意接受歐洲治療，可以送到外地，送到鏡湖醫院值理會設立的一個隔離蓬寮中。它位於澳門內港的對面，但在葡萄牙領水區域內。從今以後，凡是患有上述兩種病的病人不得在普通醫院中接受治療。”因此，在1898年的腺鼠疫流行中，共有594名患者，但只有27人在唐娜瑪麗亞癩瘋院中接受了治療，其餘者或死於家中或前往了鏡湖醫院的隔離蓬寮。⁴⁴

關於清潔，消毒和埋藏屍體：

去臘沙欄仔一帶時有不潔之居藏納病人，華政微有所聞，即率暗差嚴為搜查，各等不潔之屋一律督令洗滌。下環街巷常有遺矢於途，西差禁無可禁。惟行巡視，潑以辟穢藥水。⁴⁵

上述防疫抗疫措施和香港的措施類似，分別者在於澳葡政府非常倚重華人的民間力量，在很多措施上都以華人組織或華人領袖作協調甚至主導。例如設立防犯鼠疫公會，以華人紳商為成員，實行清潔和衛生措施；又如以華人醫院鏡湖醫院為專治鼠疫的醫院，同時尊重中醫和中國傳統，並不強行把病人搬到鼠疫醫院集中治療，而是把華人的病疫事務全權交給鏡湖醫院，葡人並未監察或過問。

石角嘴新設之鏡湖醫院分局，既得地利，復竭人功.....統照華人規程，西醫不行過問，緣是人心歡暢，不起驚惶，安心調治，凡進斯廠者，多有回春。云該廠紳董何、盧兩商，既捐資財，又復不憚勞苦，按日赴廠指點，故人人不敢偷安。⁴⁶

44. P.J. Peregrin da Costa. *Medicin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Em José da Conceição afonso. 2007. Macau : Contributos para a História do Abastecimento de Água Potável à Cidade. Em *Revista d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de Macau*. Número 75 (1 de 2007). P.1283.

45. “平安告慰”，《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二月十七日，第165頁

46. “辦理妥善”，《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五月二十日，第243頁

由此可見，澳門在這場鼠疫中所採取的抗疫手法，是一種間接式的管理手法，澳葡政府對華人事務的干預不多，只是訂下規章和守則，然後交由華人組織或華人領袖去和居民溝通和實行，而不是港英政府的直接管理和監察。

四、港澳華人社團發揮的作用

1894至1895年在港澳出現的鼠疫及兩地的抗疫措施，多多少少體現了政府的管理手法和成效。當時的香港和澳門，同樣是多數為華人的社會，其管治者英國和葡萄牙，都是歐洲國家，並且以殖民者的姿態管治港澳，兩個政府的權力來源，都是所謂的殖民權力，即殖民地政府對被殖民者的管治權。但這種權力除了壓制性和支配性的一面，也有將管治權進一步合法化而建構的西方現代性和文明性的話語力量。正是這種西方文明的優越性和現代化的強勢影響力，令在這場19世紀末期出現的鼠疫中，使西醫霸權在殖民地得以確立。在此所謂霸權是對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對權力說法的修飾，強調的是被統治者對統治者價值觀的接納和認可；葛蘭西的觀點是在於權力來自精神層面的干擾上，也就是說掌握權力的一方不一定是在武力的優勢上，而是掌握“智識和道德領導權”的意識形態層面，使同類文化和價值連結成為一種現實的力量。⁴⁷ 因為以西方手法管治華人社會，或多或少會出現文化及傳統的差異甚至衝突，故此霸權的形成與確立不僅僅依賴於由監獄和法院等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所建立的強制性政治支配，同時，它也強調通過學校和家庭等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實現被統治者對統治者主流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的默認與接受⁴⁸，上文所述港英政府藉著這次鼠疫，迫使東華醫院進行改革和及後逐步削弱東華醫院的華人代表地位，就是這種霸權形式的實現。

當時香港和澳門政府雖然同樣實行殖民管治，但兩者對待華人的管理手法卻截然不同。港英是直接的、強勢的管治，若以現代公共行

47.（意）葛蘭西著，曹雷雨等譯：《獄中割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44-145頁。

48. 同上。

政管理手法闡釋，當時的抗疫手法，是一種強調效率的管理手法。正如美國政府管理學者古利克（Luther Gulick）所指，要實現理想的管治，效率該作為最終目標，要達到這個目標，其他效果可能受到限制：

無論在公共或私人管理上，基本善就是效率。行政學的基本目的就是以最少的人力材料的消耗來完成手頭的工作。因此，效率是行政管理的價值尺度的頭號公理……⁴⁹

當時的港英政府在對香港行政管理的原則上，無疑是以傳統的殖民手法，高壓執行，並強制要求華人遵從；在應對鼠疫這個問題上，則強調如統一指揮、協調控制、功能部門化等，為有效的行政管理提供種種準則，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效率標準，即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效果。建立起權力集中、指揮統一、體系完整、分工明確、責職分明的系統。⁵⁰ 在1894年的鼠疫中，港英政府的防疫措施正是這種集中權力，體系完整和責職分明的管理手法的體現：

西人合一處之力以治一地之疫，凡經理其事，必欲一邑之中無一處不查察，無一人不約束，使去汙穢而就清潔，惟其用心也專故，其收效也亦易。⁵¹

對於代表香港華人的東華醫院，政府並未倚重。由當時的港督至醫療官員，對中國醫院的設備到中醫的成效，都充滿蔑視和不屑。時任國家醫院署理院長（Acting Superintendent of the 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的勞森醫生（James Alfred Lawson）這樣形容東華醫院設於堅尼地城玻璃廠鼠疫醫院：

這家醫院的衛生情況給他們帶來了很多麻煩，必須採取一切極端措施改善這家醫院的衛生情況，以避免使這家醫院成為每個入院病人

49. Luther Gulick et al. 1937. *Science, Value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 (ed. By Gulick and Urwick).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50. 陳振明：“從公共行政學、新公共行政學到公共管理學——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領域的‘範式’變化”，《政治學研究》，1999年第1期。

51. “論中西治疫之不同”，《申報》1894年5月25日。

的死亡陷阱.....為了改善玻璃廠醫院的通風情況，必須把窗戶上的玻璃全部拆除。⁵²

在事後的多份政府報告中，港英政府認為此次抗疫成功，全在於其有效的隔離治療、清潔和消毒措施，以及處理鼠疫死者屍體，反而東華醫院未能協調華人對這些措施的反彈被指抗疫不力。在鼠疫基本結束之後，政府特意於1894年9月在市政廳（City Hall）舉行表彰大會，感謝社會各界在抗擊鼠疫過程中的工作與奉獻，其中包括陸軍、海軍和常設委員會成員及其屬下的醫護與衛生人員等等，可是為防疫工作作出巨大貢獻的東華醫院卻沒有贏得任何官方的讚揚與表彰。在其後的社會發展中，港英政府並未有讓出多少權力予以東華醫院為代表的華人組織，反而逐步削弱這些華人組織的政治權利和社會影響力，以直接方式管理華人社會。

澳葡政府所採取的是一種間接管理的手法，在公共行政理論中，屬於政治學家威爾遜（Woodrow Wilson）和古德諾的政治與行政二分法，即政府被分解成兩種職能及過程：一種是政治領域，即政策和法律的制定過程，其中包括民主的種種程序如意見表達、投票和政黨等；另一種是行政領域，包括法律和政策的執行，它所包含的機構及程序才是行政學研究的對象。⁵³ 在澳葡政府處理鼠疫的手法中，所制定一系列的章程和規定，是政府主理政治領域；而依靠華人社團和華人領袖的力量去協調和執行，則是政府在行政領域中，進行權力的讓渡，使一系列應對鼠疫的政策和措施得以落實。

1894年香港出現疫症而澳門嚴於防疫之時，澳葡政府要整飭潔淨華人民居，其手法和香港大相徑庭，香港是直接派政府人員到民居內強行消毒和清洗，而澳門則設立了一個公會，以華人紳商作代表處理潔淨事宜：

照得所有華民居戶，例應整飭潔淨。今查本澳華紳襄理一切，最屬合宜。俾使居所等處，安靜如常，並無各鄰埠所流行之疫癘。是以

52. James A. Lowson. The Epidemic of Bubonic Plague in Hong Kong, 1894.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April 13, 1895), P.394. (<http://sunzi.lib.hku.hk/hkgro/index.jsp>)

53. Woodrow Wilson.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in Jay M. Shafriaz & Albert C. Hyde (eds.), 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ak Park, Illinois: Moore Publishing Company, Inc., P.3.

特飭設一公會，以資勸理。茲割委佩帶頭等寶星紳士何連旺為該會會長，其周炳垣、黃普堂、關蕙田、羅逸雲、覃福田、梁連、朱鳴崗、高藹山、鄭侶彭、梁耀鰓、葉侶珊、岑俊臣等為會副，如欲多增紳士，亦屬可行。而該會須與華政務廳會商，設法籌畫，自能辦理裕如也。為此合割本澳各官員軍民人等一體知悉。須至札者。⁵⁴

此外，澳葡政府雖然設立了專為鼠疫患者而設的醫院，但既沒有勉強這些華人以西醫的手法醫治，也沒有強行要他們集中到某一兩間醫院，而是讓由華人設立的鏡湖醫院主理：

前錄華人商紳擬在灣仔建搭大棚廠一座，安置病眾，頃已在廳官處稟准……澳中華紳盧卓之、何穗田竭力襄助，立督工匠人役擇得石角嘴地方附近拱北關分廠海旁墳區，建成大廠，分作兩層，約容數百人之廣……何、盧各題捐善費銀一千元，公棧亦助銀千元，在籍候補道陳芳捐銀四百元，其餘紳商並解囊以相助，多寡之數，各視其家之有無。甚善舉也……連日，澳督，主教暨華政官並到醫院巡視病人，華政猶勤勤可嘉。⁵⁵

結果，在鏡湖醫院的主導下，澳門的華人未有如香港，對政府的種種防疫措施大為反感以至出現對立和衝突。而鏡湖醫院和東華醫院的角色也截然不同，東華醫院是在政府與民間的對立中左右為難，礙於政府的遏制和監督，既不能順應華人社會的民意，也達不到港英政府減少病患和阻止疫症蔓延的要求。在兩者皆得罪的情況下，東華醫院內得不到華人的支持，外則處處受政府干預，其社會角色漸漸淡化。反觀鏡湖醫院，則是儼然澳門華人的代表，鏡湖醫院的主事者同時也是華人領袖，在澳門社會地位高，號召力強，可謂一呼百應。在澳葡政府少干擾，不遏制，反而給予更多的政治權力後，這個華人組織掌握了話語權，作為華人的代表和政府交涉，以至之後的社會地位越來越強，同時造就了澳門華人和葡人和諧共處的局面。其實當時還有另一個華人慈善機構同善堂，也在澳門華人社會中擔當了很重要的

54.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六月初九日（第二十三號）。

55. “善則旌之”，《鏡海叢報》，光緒廿一年五月初六日，第232頁。

角色，但同善堂於1892年底創立，而且是個綜合型的慈善團體，因此在1895年鼠疫肆虐時，其影響力和社會作用未如鏡湖醫院而已。

五、結語

港澳的華人組織在這場疫症中發揮的作用不同，所造成的社會影響和發展，也截然不同。澳門的華人組織如鏡湖醫院發揮了很大的協調作用，從而讓這些組織在今後的社會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澳門也發展成一個政府—社團—民間的二元社會。華人社團的力量相當大，在澳門回歸之前，華人社團和社團領袖一直係華人社會的代表，與澳葡政府溝通，為華人爭取政治和社會權力，這些社團由於社會力量積累深厚而成為實力雄厚的政治組織，從爭取華人權益到參政議政，讓澳門發展成一個社團社會。反之，作為香港華人代表的東華醫院，卻在這場疫症中遭到港英政府的諸多壓制，其協調和代表角色越形削弱，最後成為專職的醫療機構。而港英政府也未有讓渡政治權力予香港的華人組織，香港在殖民政府的強勢管治下，接受了更多的西方意識形態，而成為今日中西文化交匯，而又三權分立，西方政治色彩濃厚的中國特別行政區。